渝西石刻之于方志史料价值举隅*

杨 梅

提 要：石刻文献是编纂地方志书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。历代方志编纂者借助石刻资料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但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。今以渝西石刻为据，对其中所涉明代地方官之姓字里籍、科考仕宦等进行梳理，以校补方志之讹漏。

关键词：渝西 石刻 方志 校补

地方志书者，地方之全史也。地方志书编纂由来已久，其起源可追溯至汉光武帝刘秀下令编写《南阳风俗传》^①。自宋以降，方志编纂体例趋于定型，志书大量增加，及至明清，举凡府、州、县，俱有其志。纂修地方志书，石刻碑文是可靠的文献资料之一。重庆境内石刻以渝西地区为最，方志编纂者借助该地区石刻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^②，但由于方志编纂工程浩大，所涉文献资料浩繁，参与人员众多，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。今以渝西石刻为据，对其中所涉明代地方官之姓字里籍、科考仕宦等进行梳理，以校补方志之讹漏。不妥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一 以石刻考地方官之仕宦履历：范府

范府，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举人^③。范府之仕宦履历，乾隆《贵州通志·人物·乡贤》有载：

范府，字季修，贵阳人，正德丁卯乡举，授巴陵教谕。贼蓝、鄢起，都御史林俊召致戎幕，预参机宜，迁遂宁令。奖善良，锄强梗。增修石城，不扰民而功就，擢雅州守。平高继恩之乱，升重庆府同知。致仕归，与乡人士结溪山诗社，朝夕唱和，著有《唐山诗集》。其没也，蜀人哀之。^④

范府之任职年份，乾隆志阙如。考四川方志，雍正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载范府于正德中任巴县教谕^⑤；乾隆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与嘉庆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俱以范府为正德朝最后一任雅州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明清以来西南地区佛教碑刻中的儒家文献整理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7XZJ002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参见仓修良：《方志学通论》，方志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9页。

② 如光绪《大足县志·官师》的编纂者利用大足境内石刻材料新增刺史1人，静南军使1人，判官5人，县令8人，县丞7人，主簿6人，典史5人，教授1人，教谕5人，训导5人；补订了大足县历代官吏之里籍、衔名、任职年份多处〔光绪《大足县志》卷6，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刻本〕。

③ 参见道光《贵阳府志》卷15《选举表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贵州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12册，第248页。

④ 乾隆《贵州通志》卷28《人物·乡贤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贵州府县志辑，第4册，第545页。

⑤ 参见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30《职官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，1986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560册，第645页。

知州^①；民国《遂宁县志·职官》载范府于嘉靖初年任遂宁知县^②；乾隆《巴县志·职官》“明重庆府同知”条阙如^③，民国《巴县志·职官》“明重庆府同知”下录有范府，列于万历朝之前，并附注“据大足县林公碑补”^④。乾隆《贵州通志》与四川方志所载有两处不同：一为范府任教谕之地，一为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。

（一）范府任教谕之地

关于范府任教谕之地究竟为巴陵还是巴县，可考之民国《巴县志·职官》所注“林公碑”。该碑即刻于大足北山佛湾北段末端之范府书《林俊诗碑并跋》^⑤：

石屋忘年纪，霜松记十围。壮容惊变尽，迂叟是真归。肩小一庄足，名逃百念希。山盘开池水，新雨厥芽肥。

风雨睡曾着，幽堂重乃心。龙归先有洞，鹿触故成林。遗蜕遭逢际，孤庐恍惚临。更阑销短烛，凉泪落衣襟。

右二诗，乃太子太保、刑部尚书见素林公之作也。正德庚午，公被召起用，征剿剧贼，巡抚四川。府时为巴县教谕，幸从事幕下，受教最深。越明年，功成身退，蜀人为立生祠。嘉靖初，科道交荐，三聘复起。其精忠大节，天下共知，无容喙者。兹累疏乞老，荣归云庄，仰慕风采，不可得见。近偶蒙寄赐小像，并云庄之怀，诚如久处密林，忽见长天也。携以公行至大足，闻有奇岩，登摹雅刻，乃大宋太史公范祖禹撰《赵懿简公神道碑》，上有遗像犹存。遂捐廩，命匠凿一石洞，以镌公之像；砉一石碑，以刻公之诗。用识蜀人之思，共传不朽云。

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，重庆府同知范府拜书，知大足县事临安唐鳌□。^⑥

据该诗碑跋，可知正德庚午（正德五年，1510）范府时任巴县教谕，非乾隆《贵州通志》所载“巴陵教谕”。巴陵，岳阳之古称。林俊巡抚四川^⑦，应付民变，断不可与远在湖南岳阳的“巴陵教谕”共事。且考光绪《巴陵县志·职官》，有明一代，巴陵县儒学教谕题名亦无范府^⑧。因此，范府任教谕之地，为《林俊诗碑并跋》及雍正《四川通志》所载之巴县。

① 参见乾隆《雅州府志》卷8《秩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63册，第506页；嘉庆《四川通志》卷102《职官》，巴蜀书社，1984年影印本，第3196页。

② 参见民国《遂宁县志》卷6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21册，第275页。按，民国《遂宁县志·城池》又载“正德十年，知县范府易土以石”（民国《遂宁县志》卷1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21册，第17页）。

③ 乾隆《巴县志》卷6《职官》，清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刻本。

④ 民国《巴县志》卷6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6册，第222页。

⑤ 按，民国《大足县志·山脉》录该诗碑，题为“明重庆府教谕范府书林总制诗并跋”（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6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384号，第110页），然据诗碑末题，此时范府已任“重庆府同知”。又据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：“儒学。府，教授一人，训导四人。州，学正一人，训导三人。县，教谕一人，训导二人。”（《明史》卷75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1851页）可知明代并无“府教谕”之职。由是观之，民国《大足县志》之题有失审谛。

⑥ 按，本文所用大足石刻资料，来自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与实地考察所得。唐鳌□，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录作“唐鳌翔”（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：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，重庆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67页），误。

⑦ 按，《明史·林俊传》载林俊于“正德四年起抚四川”（《明史》卷194，第5138页），然据该诗碑跋，林俊任四川巡抚在正德五年，则《明史》所记非是。

⑧ 参见光绪《巴陵县志》卷48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湖南府县志辑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7册，第263页。

（二）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

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，按乾隆《贵州通志》，范府以举人授巴陵教谕，次迁遂宁令，再擢雅州知州，循资次补，最后以重庆府同知致仕。然据四川诸志，范府之履历则多有起伏：先教谕，次知州，次知县，次同知，其间若未遭贬谪，实有悖常理。范府知雅州与遂宁县究竟孰先孰后？其中是否有贬谪？或确如乾隆《贵州通志》所载循资而除？方志与大足石刻俱难征信。幸潼南大佛寺大佛正殿右侧大佛洞左壁尚存范府题刻一则：

旧游佳处再跻攀，重见民风太古还。灯火耀江浑似画，老倪塞道却如寰。鉴亭秋月人怀玉，棠树春风我厚颜。寄语后来君子辈，循良端可对斯山。

予昔令遂宁，无遗爱。今自雅州转渝郡，偶以公务至邑。邑多盱儒恋时，而儒者为国名辅，不可得而见之。独正郎王公养浩林下，得从南津之谈，赋诗为别。状元徐茂元、王汝德、赵一元、黄大卿辈，暨耆英对堂教□□姚孝子迨□止金马桥，而春元王汝赵、黄峻卿、席大本、侯继光，拉夏仲魁诸友饮饯女文诗，偕留宿焉。明晨告别及夔送庆□□相迎不可胜地。其乡话喧腾，灯光阑珊之意。晚至下县，火明如昼。顾暂□□□已久，无足以感君之者。汝若□□，遂邑士风之古，民心之淳也。邪愧不自胜，因书石以启后之君子诗迹来。

嘉靖二年十月九日之吉旦，赐素渠子范府识。①

据其辞云“予昔令遂宁，无遗爱。今自雅州转渝郡，偶以公务至邑”及末题“嘉靖二年十月九日之吉旦，赐素渠子范府识”，则可知范府先知遂宁，次知雅州；至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范府已离任雅州。

（三）范府迁除之年份与行事

如前所述，自正德二年（1507）至嘉靖二年，十数年间，范府依次从巴县教谕除升遂宁知县、雅州知州、重庆府同知。结合石刻资料、方志文献与史乘，范府迁除年份与行事之大略可考如下。

正德二年或稍后，范府以举人授巴县教谕。正德五年，林俊巡抚四川，“召致戎幕，预参机宜，迁遂宁令”。范府于何年知遂宁县？方志未有确切记载。据明代地方官选任制度，范府以教谕迁遂宁知县，当属破例除用，且与林俊密切相关。《明太祖实录》“洪武三年十二月癸酉”条载：

吏部言：守令职主牧民宜久其任，治效始著，而知府任职尤难，非老成廉能无过者不可居其任。请自今同知一考无过者，升知府；知县二考无过者，升知州；县丞一考无过者，升知县。从之。②

又明初设巡按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，“巡按则代天子巡狩，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，举劾尤专，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”③。自明宣宗设立巡抚制度④，巡抚亦拥有巡按的权力，自是以后，“天下司、府、州、县官贤否，独在抚按”⑤。林俊任四川巡抚，举荐幕僚范府知遂宁县自

① 按，本文所用潼南大佛寺石刻资料为刘师长东惠赠，兹谨致谢忱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59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62年校印，第1161页。

③ 《明史》卷73《职官志二》，第1768页。

④ 参见《明史》卷9《宣宗纪》，第116页。

⑤ 叶春及：《石洞集》卷2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集部，第1286册，第255页。

在其职权之内。据《明史·林俊传》，林俊平定四川后，因得罪总督洪钟、御史俞缙，于正德六年（1511）十一月致仕^①。又据潼南大佛寺嘉靖二年范府书《题石磴琴声》：

十载携琴单父鸣，风熏民物自澄清。重登更得山前意，缓步犹闻云外声。岩半月明孤鹤泪，江边风细老龙惊。寺僧索我留题石，漫写新诗旧墨屏。

嘉靖癸未，素渠子范府书。

可知范府知遂宁在正德年间，而非嘉靖朝，其任职年份大致在正德六年林俊致仕前。

此后范府以遂宁知县迁雅州知州，再擢重庆府同知，皆因政绩卓越之故。据明代文官考核制度，“府、州、县正官三年一考，课于吏部，核其贤否而黜陟之”^②。如前所引，同知、县丞一考无过则可升知府、知县，而知县须二考无过方可升知州。又据《明史·选举志三》载：“考满之法，三年给由，曰初考，六年曰再考，九年曰通考。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。”^③范府知遂宁县后，“裁抑豪悍，修复学宫，易土城以石，永为一方保障，升雅州知州”^④。范府增修石城在正德十年（1515）^⑤，是时，范府当已通过初考留任。有明一代，除“员缺应补不待满者”之“推升”，官员“凡升迁，必满考”^⑥，因此，范府由遂宁知县擢升雅州知州当在再考之后，即在正德十三年前后。

关于范府除重庆府同知，乾隆《贵州通志》称因平高继恩之乱有功。高继恩之乱，《明武宗实录》“正德十四年六月庚寅”条载：

初，天全六番招讨高继恩数侵暴芦山民，知县屠峦稍裁抑之，尝系其所纵军士。继恩不能平，执峦弟岱及吏数人，遂相讦奏。镇巡议处久不报，继恩愈益无惮，率众焚掠芦山之水东清源乡，遂攻围县城。招讨杨世仁亦以事怨峦，乃助继恩兵，峦携家潜走雅州。^⑦

据明王琼《为地方紧急事》，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朝廷因高继恩与屠峦相互讦奏，命四川巡抚马昊勘问：

查得前项芦山县知县屠峦与天全六番招讨高继恩等各奏事情，已该都察院议拟，行巡抚都御史马昊会同镇守、巡按，督同都布按三司、守巡等官勘问，干碍夷情重大，即便议处具奏。于正德十三年三月内题奉圣旨，着镇巡等官勘问明白，议处停当来说。延今一年之上，不见回奏。御史黎龙奏内开无前项奏行勘问缘由，显是彼处镇巡等官故违成命，不早勘断，以致高继恩不畏国法，恃力仇杀，貽患地方，损伤国体。^⑧

因马昊等人失职，以致于酿成祸患。正德十五年，四川巡按黎龙奉旨勘处，明高继恩、杨世仁等

① 参见《明史》卷194，第5138页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45，第882页。

③ 《明史》卷71《选举志三》，第1721页。

④ 民国《遂宁县志》卷6《政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21册，第289页。

⑤ 参见民国《遂宁县志》卷1《城池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21册，第17页。

⑥ 《明史》卷71《选举志三》，第1716页。

⑦ 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75，第3404—3405页。

⑧ 王琼：《晋溪本兵敷奏》卷8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史部，第476册，第25页。

罪行，并建议调兵征讨^①。至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四川抚按派兵“剿天全六番招讨司乱夷，斩招讨使高文林，擒招讨使高继恩”^②。虽然乾隆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等皆未载范府参与平高继恩事，但范府时任雅州知州，自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又据前揭大足石刻《林俊诗碑并跋》与潼南大佛寺题刻二则，范府已于嘉靖二年前离任雅州，则其任雅州知州一任期满即擢升重庆府同知，可见在平高继恩之乱中范府功绩显著。由是推知，范府任重庆府同知当在嘉靖元年（1522）前后。乾隆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及嘉庆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载范府为正德朝最后一任雅州知州与此正合。

二 以石刻核地方官之次第：明嘉靖朝大足知县

明嘉靖朝之大足知县，光绪、民国《大足县志》俱录有4位，并各注所据。光绪志《官师》：

袁衍：按，衍，桂林人，于嘉靖时任，曾补修城四门。旧县志作“袁衍四”，误。见宝顶山石刻。

唐鳌：嘉靖时任。按，鳌，临安人，见北山石记。

李茂阳：嘉靖时任。见董极《孝泉碑记》。

董极：嘉靖时任。按，极修启圣乡贤名宦祠，建尊经阁。^③

民国志《职官表》：

嘉靖三年甲申：唐鳌，见北山石刻。

二十八年己酉：李茂阳，旧志注：“《云南通志》：‘知大足县，操谕有方，盗息民安，以直忤上官，乞归。’”

三十七年戊午：董极，见赵贞吉《建尊经阁碑记》。

四十年辛酉：袁衍，见宝顶山石刻。^④

以上4位知县，李茂阳与董极之次第，二志所录无别，然考其所据，不无矛盾之处；袁衍与唐鳌，二志所据石刻相同，排列次第却有别。

（一）李茂阳与董极

李茂阳，字三山，云南昆明人。据康熙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，李茂阳以举人授四川南充教谕，后因政绩显著迁大足知县。^⑤李茂阳何时知大足县，康熙志阙如。李茂阳之科考年份，康熙《云南府志·选举》、道光《昆阳州志·选举》俱载为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甲午科举人^⑥。又康熙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称李茂阳与兄向阳于“嘉靖癸卯、丙午相继举于乡”。李向阳，康熙、

① 参见王琼：《晋溪本兵敷奏》卷8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476册，第25—26页。

②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3，第138页。

③ 光绪《大足县志》卷6《官师》。按，道光《重庆府志·职官》“大足县知县”所载次第同（道光《重庆府志》卷4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5册，第157页）。

④ 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4《职官表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384号，第374—375页。

⑤ 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12《人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1册，第316页。按，李茂阳任南充教谕事，康熙《顺庆府志·秩官》、嘉庆《南充县志·职官》俱阙如。

⑥ 参见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10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1册，第255页；道光《昆阳州志》卷12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3册，第369页。

道光二志俱载为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人，由是推之，李茂阳则为嘉靖丙午科举人，与二志《选举志》所载不合。李茂阳任南充教谕事，嘉庆《南充县志·职官表》、民国《新修南充县志·职官表》俱失载。

李茂阳之科考年份可据大足石刻所载其知大足县之年份推知。李茂阳知大足县的时间，光绪《大足县志》所记有二：其《舆地》“孝泉井”条下记为“嘉靖己酉”，即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而该条下所录明董极《孝泉碑记》又云“嘉靖己卯，三山子李茂阳氏来令兹土”^①。嘉靖朝纪年无“己卯”，则“己卯”当为“己酉”之误^②。李茂阳擢升大足知县乃因其任教谕后，南充县“士类多所成就”^③之故。一地之人才非朝夕可就，若李茂阳为丙午科举人，自其任南充教谕至除大足知县，不过短短3年，实难取得“士类多所成就”之政绩。由是观之，李茂阳当为甲午科举人。康熙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之“丙午”，或因刊刻致误，或因修志者以茂阳为幼弟，揣测其科考年份当晚于长兄而误改。

董极，其里籍、科第俱不可考。董极任大足知县的时间，据民国《大足县志·文征上》所录碑文有二：一为嘉靖乙酉。明赵贞吉《尊经阁记》云：“嘉靖乙酉春，知大足县事董子极建阁于学宫之左，以奉六籍。”^④嘉靖乙酉，即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与民国志《职官表》所录矛盾。一为嘉靖己酉后十年。董极《孝泉碑记》云：“嘉靖己酉，三山子李茂阳氏来令兹土……因三山子解绶，而匠遂停镌。逾十纪，余忝继其职。”^⑤据该碑记，董极知大足县在李茂阳后10年，即在嘉靖己未前后，《尊经阁记》所载“嘉靖乙酉”当误。

（二）袁衍与唐鳌

袁衍，广东临桂人，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举人。袁衍的仕宦履历有三：一为长乐县儒学教谕。康熙《长乐县志·秩官》、道光《长乐县志·职官表》俱载袁衍于正德十二年任长乐县儒学教谕^⑥。二为长乐知县。雍正《广西通志·选举》、嘉庆《临桂县志·选举》俱载为“长乐知县”，任职年份未详^⑦。三为大足知县，即光绪《大足县志·官师》、民国《大足县志·职官表》所载。袁衍于长乐县所任究竟为儒学教谕还是知县？抑或以教谕迁知县？惜无文献可征。关于袁衍知大足县的时间，光绪志录作嘉靖朝之首，民国志详载为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，二志皆附注“见宝顶山石刻”。考现存大足石刻，唯刻于宝顶山圣寿寺玉皇殿内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曹琼撰《恩荣圣寿寺碑》碑阴之《游宝顶寺和壁间郭通府韵》为袁衍所书：

游宝顶寺和壁间郭通府韵一首，虽词格鄙俗，殊不可观，将以纪岁月云耳。

拨冗春游眼界明，远迎萧鼓数山僧。观风愧我荒新政，爱古令工洗旧铭。草软陇头黄犊卧，松香洞口白云生。千秋胜概都收览，谁禁禅堂笑语散。

时嘉靖庚寅仲春二日，知大足县事桂林袁衍书。

① 光绪《大足县志》卷2《舆地》。

② 按，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录董极《孝泉碑记》即为“嘉靖己酉”。

③ 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12《人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1册，第316页。

④ 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8《文征上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384号，第712页。

⑤ 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8《文征上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384号，第715页。

⑥ 参见康熙《长乐县志》卷3《秩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广东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23册，第97页；道光《长乐县志》《职官表》卷2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广东府县志辑，第23册，第237页。

⑦ 参见雍正《广西通志》卷72《选举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567册，第229页；嘉庆《临桂县志》卷23《选举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，第15号，第380页。

据该诗刻末题，袁衍于嘉靖庚寅，即嘉靖九年已在大足知县任上。

唐鳌，云南临安人，明正德八年（1513）举人^①。据前文所揭大足北山佛湾《林俊诗碑并跋》末题“嘉靖甲申秋八月吉，重庆府同知范府拜书，知大足县事临安唐鳌口”，可知嘉靖三年（1524）唐鳌已任大足知县，则唐鳌早于袁衍任大足知县明矣。光绪志所录袁衍、唐鳌次第当误。

民国志将袁衍列于唐鳌、李茂阳、董极3人之后，并以“宝顶山石刻”为据，录其为嘉靖四十年知县。嘉靖朝共45年（1522—1566），大足县令当不止4位。抑或袁衍于嘉靖四十年再次任大足知县？宝顶山另有嘉靖四十年袁衍题刻？然据民国志所录大足石刻，宝顶山石刻为袁衍所书者唯嘉靖庚寅年诗刻而已，则民国志所录当误。由是观之，就现存石刻资料而言，嘉靖朝大足县令次第当为唐鳌、袁衍、李茂阳、董极。

三 以石刻校方志之讹漏：黄文与康圭

因年代久远，加之史乘无载，不少地方官之姓字里籍、仕宦履历等皆无传世文献可征。方志纂修者或因未能充分搜集、考察石刻文献而漏载、误载地方官之仕宦履历；或因囿于当地文献资料，在考察宦游他乡士子之履历时难免有不确之处。

（一）黄文

潼南大佛寺大佛洞右壁现存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黄文书“石磴琴声”并跋一则：

石磴琴声

予因公务至此，仅旬日。每登是磴，尝闻清音彻耳，宛若琴瑟之声，故名“石磴琴声”，以纪岁月云耳。

大明成化二年岁在丙戌中秋后三日丁巳，四川潼川州判官湖南星沙黄文书。

本山修造具戒比丘智慧镌石。

据其末题，黄文乃成化初年潼川州州判。黄文在四川之履历，未见载于四川方志。嘉靖《四川总志·郡县志·潼川州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·职官·潼川府》等俱未录明潼川州州判^②，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·职官》“明潼川州判官”条下亦阙如。^③

考嘉靖《长沙府志·选举》，其“岁贡”条下列“黄文，潼州州判”^④，光绪《湖南通志·选举》“贡生”下列“黄文，潼川通判”^⑤，二志俱无任职年份。乾隆《长沙府志·选举》、乾隆《湖南通志·选举》“贡生”条下俱录作州判，其任职年份、地点则阙如^⑥。据潼南大佛寺石刻，黄文乃四川潼川州州判，其任职之地非嘉靖志所录之“潼州”，职事亦非光绪志所录“通判”。明初人才选拔采用进士、举贡、吏员“三途并用”的方式，其中“外官推官、知县及学

① 参见雍正《建水州志》卷5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54册，第334页。

② 参见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卷11《郡县志·潼川州》，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8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42册，第218页；嘉庆《四川通志》卷102《职官·潼川府》，第3203—3204页。

③ 参见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卷19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15册，第386页。

④ 嘉靖《长沙府志》卷3《选举》，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刻本。

⑤ 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卷146《选举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644册，第630页。

⑥ 乾隆《长沙府志》卷27《选举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299号，第695页；乾隆《湖南通志》卷87《选举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218册，第19页。

官，由举人、贡生选”^①。黄文以贡生授潼川州判官，其品秩虽不高，仅为从七品^②，但因潼川州在明代为直隶州，其州判亦属要职，地方志书不应失载。

（二）康圭

康圭，道光《重庆府志·职官》“大足县知县”条下列之于万历朝之首^③；民国《大足县志·职官表》录为万历朝任职年份不详之大足知县，并附注其据云“见宝顶圆觉洞石壁诗刻”^④。民国志所据之诗刻，即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洞甬道右壁之《秋日同冯、罗斋长游圆觉洞有怀》：

石室何年敞，山幽翠且重。晴云常满户，紫气欲摩空。一樽聊避俗，二妙更从容。踏遍诸天路，悠然兴不穷。

岭南康圭题，门生冯臣虞、罗如纶刻。

据该诗刻末题，康圭为岭南人。考广东方志，万历《广东通志·郡县志·广州府》“乡举”条下载“康圭，通判”，科考年份阙如^⑤。雍正《广东通志·选举》“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乡试榜”下有康圭，其注云“顺德人，通判”^⑥。道光《广东通志·选举》、咸丰《顺德县志·选举表》俱录康圭之姓字里籍、科考年份与任职地：“顺德人，字雅堂，乌蒙府通判”，“字雅堂，龙江人，通判乌蒙府”，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乙卯科举人。^⑦关于康圭之任职年份，广东诸志皆阙如。

据咸丰《顺德县志》等志，康圭在四川之职事为乌蒙府通判。乌蒙府，即乌蒙军民府，唐时为南诏部地，宋大理时为乌蒙部地，元代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乌蒙路，隶属云南行省。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为乌蒙府，属云南布政司，十六年改属四川布政司，十七年升为军民府。^⑧清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改设流官，隶云南。六年，置恩安、永善两县。九年，改名昭通府^⑨。康圭在四川之履历，四川、云南方志，如嘉庆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、康熙《云南通志·秩官》、嘉庆《永善县志略》、宣统《恩安县志·秩官》及民国《昭通志稿·官师》等俱失载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，通判品秩为正六品，知县为正七品^⑩。康圭是否先以举人知大足县，再迁为乌蒙府通判？不得而知。民国《大足县志》仅据上文大足石刻而以康圭为万历朝大足知县，持说有失审谛。

综上所述，作为记录和保存地方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，地方石刻不仅可校该地区旧志之讹漏，亦可补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地区旧志之缺略，更可为现今新志的编纂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《明史》卷71《选举志三》，第1715页。

② 参见《明史》卷75《职官志四》，第1850页。

③ 参见道光《重庆府志》卷4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5册，第158页。

④ 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4《职官表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384号，第377页。

⑤ 参见万历《广东通志》卷20《郡县志·广州府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史部，第197册，第475页。

⑥ 雍正《广东通志》卷33《选举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563册，第428页。

⑦ 道光《广东通志》卷74《选举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670册，第437页；咸丰《顺德县志》卷10《选举表》，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刻本。

⑧ 参见《明史》卷43《地理志四》，第1039页。

⑨ 参见《清史稿》卷74《地理志二十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标点本，第2339页。

⑩ 参见《明史》卷75《职官表四》，第1849、1850页。